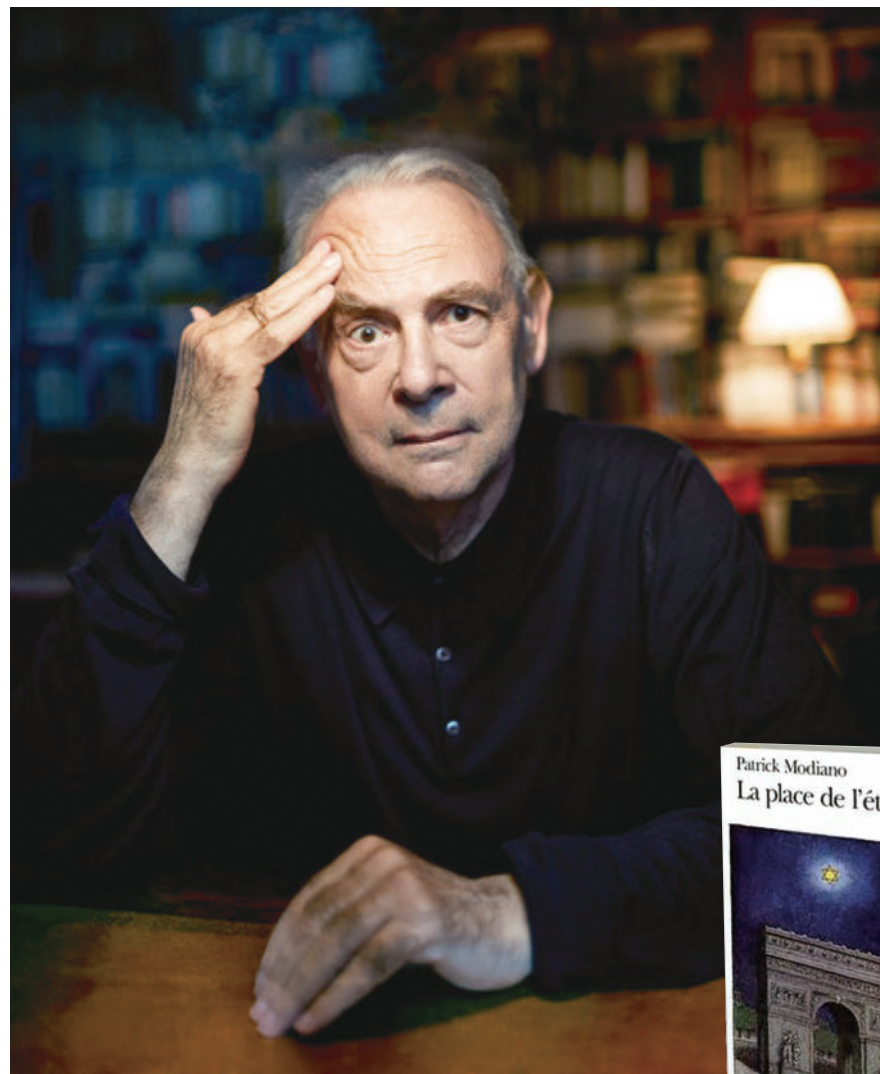


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迷失:我们的存在方式

袁筱一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又一个法国人!

无论如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诺贝尔文学奖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就连他的出版商安托瓦纳·伽里玛都表示,他以为2008年阿克塞尔·汉森获奖之后,法国人至少要等上30年才能迎来下一个诺奖。可莫迪亚诺的获奖让他的等待整整提前了24年。又一个法国人!在大家惊呼的同时,伽里玛的转述(因为瑞典没有能够在宣布获奖第一时间联系上作家本人),电话里,莫迪亚诺得知自己获奖后,“带着他一贯的低调说:‘真奇怪’,还表示想要知道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会选他。他觉得有些‘不真实’,因为竟然能够在同样的地方‘重逢’他曾经如此欣赏的、诸如加缪之类的伟大作家。”

当然也有早就“慧眼识珠”的,两年前莫言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法国就有莫迪亚诺的粉丝在记述“今年的奖项由一位中国伟大的作家摘得”的同时,坚定地表达:“我相信,在未来不算太长的时间里,莫迪亚诺一定会获奖”,因为,在她的眼里——她申明自己不是阿克塞尔·汉森的粉丝——莫迪亚诺才是世界的、最伟大的法国作家。

当然,奇怪也罢,伟大也罢,终究是他人的评价。一个真正的写作者,绝非是靠对奖项的向往和追求就能够成就的;反过来,也绝非会因为获奖与否改变自己的写作。实际上,当我们在惊呼“又一个法国人”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的事实是,如果说阿克塞尔·汉森和莫迪亚诺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道,应该算是同代的写作者,他们之间更大的相同点在于,迄今为止,他们都坚持写了将近50年。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什么都是留不住的,包括记忆、过去,甚至青春,然而文字却奇迹般地留下了隐藏在某处似真非真之后的真相。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委皮特·恩格朗在电视的采访中还提到过其作品的“前后呼应”,殊不知写作者最大的“前后呼应”依靠的从来都是对文字的信仰,并且需要时间的佐证。

记忆、过去、梦,这些都是瑞典在宣布奖项归属时,放诸莫迪亚诺身上的关键词。当然,在他用于再现“最难捉摸的命运”的“记忆的艺术”之外,特别提到的还有多次出现在他笔下的“德占时期”的世界。莫迪亚诺的小说世界的确是从德占时期的巴黎揭开序幕的。1968年,他凭借《星形广场》获得罗歇·尼米埃奖。小说的主人公和他一样——更确切地说,是他父亲一样——具有犹太血统,最终死于星形广场,据说隐藏着犹太人佩戴的星形标志的那个地方。但是,与其说这是一部直接书写犹太人在二战期间悲惨命运的小说,毋宁说是关于父辈命运的小说,只是放在德占巴黎那种阴暗暧昧的氛围下,让人再难相信仅凭正义、道德或者自己设定的真理就能够判断一切,解决一切。德占法国时期的不明朗为莫迪亚诺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者都没有离开。

《星形广场》中那位反犹的犹太人主人公什勒米洛维奇让人联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之际,遭到德国枪决的法国作家莫里斯·萨克斯。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暧昧:公开宣扬号召抵抗纳粹德国,为盖世太保服务过,投身过黑市交易,却又因为拒绝揭发抵抗组织里的一位耶稣会神父而遭到逮捕,乃至最后命丧黄泉。当时只有23岁的莫迪亚诺提出的问题是:叛徒和英雄可以是同一个人吗?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和行为吗?如果不能,那只命运的黑手又是来自哪里呢?同样,在这样的环境下,人能够确定自己吗?凭借血缘、出身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某种归属就确定自己的身份?

正因为无解,所以只能将追寻继续下去。不知道是否因为那个童年时代总是不在场的父亲,抑或是9岁时就因为白血病去世的弟弟,在莫迪亚诺小说创作的初期,他显然是对于父辈——而不是简单的“父亲”——更感兴趣。或许与其父辈不同,因为没有战争时期的经历,没有立场需要撇清,莫迪亚诺的暧昧当时打破的正是法国对于德占时期不能言说的禁忌。战争结束之后才出生的他对战争并没有直接记

忆,有的只能是追寻。这也奠定了他从写作伊始,就用追寻来完成失败的身份建构的写作模式。而对于作者来说,其后不久的《夜巡》和《环城大道》应该是和《星形广场》一起,完成了他的所谓“父辈三部曲”,更加深了他对于集体和个人记忆交织的“追寻”模式。简略却又没有忘记提到“德占法国”的诺贝尔奖授词更看重的应该是莫迪亚诺的“记忆”。恩格朗果然也在电视采访中称,“莫迪亚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鲁斯特”。

《暗店街》与《青春咖啡馆》

普鲁斯特,当然是以别样的方式。因为普鲁斯特的记忆与莫迪亚诺的记忆会呈现不同的画面、不同的过去;因为普鲁斯特的记忆是柏格森的,而莫迪亚诺的记忆是弗洛伊德(?)的;普鲁斯特的记忆需要宏大叙事,而莫迪亚诺的记忆只需要一个人走入迷宫。唯一相同的,是记忆的暧昧与需要重生的本质。

出道10年之后,莫迪亚诺凭借《暗店街》获得了龚古尔奖。依旧是发生在德占时期法国的故事,但是主角颇为耐人寻味:一个因为偷越边境受到打击而丧失记忆的侦探,一个对自己的过去发生兴趣、不断追寻、并试图进行重建的侦探。小说的开篇后来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被引用。主角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很不确定的感觉让人尤为着慌。一个病理性的断层足以消解我们对于自身的坚信不疑,这是怎样的一个设定呢?

从《星形广场》到《暗店街》,莫迪亚诺对于事件本身的兴趣越来越淡。德占法国越来越淡化为一个因为秘密、谨慎与禁忌的要求而变得虚实相间的背景。主人公对要反过来加强于他的记忆碎片,他一下子不知该如何判断:我究竟是哪一个呢?卷宗材料上有待拼凑的那个?还是坐在这堆卷宗材料前,不知道该不该调查下去,并接下去的这个有关身份的问题尤为残酷,却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凸显了小说的现代性,尤其连接上将他带入小说界的导师意义的人物雷蒙·格诺,尽管他与格诺的乌力波始终保持距离。

是这点距离让他成为莫迪亚诺,而不是差不多同时代写作的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佩雷克或别的什么人。这一点在《青春咖啡馆》里似乎昭示得很清楚。《青春咖啡馆》并不发生在战争的背景下。巴黎(还是巴黎!),出生于战争之后,并不背负可供升平的悲剧重荷的那一代人的茫然和孤独,逝去的时光里青春的味道,这些是可以用来简述《青春咖啡馆》的元素,足以令中国当代的文青“与我心有戚戚焉”。

依然是记忆和追寻。然而,以前没有被《星形广场》或者《暗店街》打动的读者大约都被《青春咖啡馆》中华丽的忧伤震撼了。《星形广场》里能够瞥见的是塞利纳、勒克莱齐奥和弗洛伊德,对那段历史不甚敏感的读者多少有点提不起兴趣;《暗店街》虽然已经不再需要犹太作家的原型,可仍然是在德占法国的阴暗背景下,然而《青春咖啡馆》里的德波、德勒兹和尼采却充斥着浪漫的色彩。德波的那句“在真实生活之旅的中途,我们被一缕绵长的愁绪包围,在挥霍青春的咖啡馆里,愁绪从那么多戏谑的和伤感的话语中流露出来”,简直可以让人落泪。进入21世纪的莫迪亚诺似乎也开始构建属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记忆了,虽然一直延续使用侦探的形式,虽然结果仍然是失败,但,毕竟是距离近了。

我好像也是在阅读《青春咖啡馆》的时候对莫迪亚诺有了一点感觉的,以至于怀疑这是否出自《暗店街》——这部我最早读到的莫迪亚诺的作品——的作者。对于我来说,逃离、消失、追寻,这些比德波、德勒兹和情境主义更让人动心,也恰恰是逃离、消失和追寻让我认识到了莫迪亚诺。莫迪亚诺的人物总是在消失,不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解决,就是以那种方式得到解决,再不然还可以自己解决,淡然得仿佛不想给这个世界再添麻烦似的。唯一可以用来勉强当作消失原因的借口竟然还是《星形广场》里的“我累了”,虽然作品所依托的环境可以发生改变,咖啡馆里,不同线索编织完成的露姬,也唯有用“我累了”三个字可以给个交代。

想到两年前陷在《青春咖啡馆》中的情绪,今天走了这么远,再回头望去,可以有稍微理性一点的解释:莫迪亚诺开始追寻自己了,于是作为读者也有了追寻自己而不得的惆怅。毕竟,在现代社会里,用德波的概念来说,谁不会有在“坚硬线”与“逃逸线”之间徘徊着的青春呢?

然而,《青春咖啡馆》让我在彼时想起的,那个骤然间也决定消失的朋友,以及我们曾经一起感喟过迷失的青春,而今也已经随天意消失了的,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和《青春咖啡馆》一起,送给我一缕“绵长的愁绪”呢?倒是莫迪亚诺应该知道,他写了40年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被定义为迷失的那样东西,是他的《青春咖啡馆》成为“最令人心碎”的一部作品的原因吧。

新寓言?

在逸出文学的轨道——莫迪亚诺的作品有时确实能起到这个效果——之后,我们还是回到文学。二十几年前,莫迪亚诺被介绍到中国,也和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一起,被贴上了“新寓言派”的标签。

然而“新寓言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好像谁也讲不清楚,大概就是有谁这么一说,被顺手拿来这么一用。在这个已经不再有文学流派,写作者们也越来越多不可能围绕某个精神领袖以统一的行动纲领来写作的时代,诸如“新寓言派”之类的模糊标签可以满足我们对“简而言之”的喜好,并且以此对付任何一个我们都无法“简而言之”的法国当代作家。

在2007年《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的末尾,法国当代文学权威批评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匆匆进入20世纪后半叶,因为距离不够,在“乌力波”之后就无法再有任何以小组或者所谓流派为基础的评价,但是在题为“永恒的叙事”的一节中,他给了图尔尼埃、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单独的位置。在分别以简洁的笔触将三人的作品做了大概的描述与分析之后,他写道:“我们当然还能提到世纪末其他忠于叙事的小家,但是惟有这三个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似乎已经得到确认,其他的或许还有基尼拉尔……昆德拉……”而对于莫迪亚诺的语言风格,贡巴尼翁的评价是,“厌倦了第一个三部曲(《星形广场》《夜巡》《环形大道》)所表现出的才华横溢甚至有些无度的风格之后,莫迪亚诺的语言越来越平滑、透明,或者说归于古典”。

在这三个被贡巴尼翁定义为世纪末的叙事三杰中,恰恰莫迪亚诺离真正意义的“寓言”最远,而且距离和昆德拉与“寓言”的距离大致相当。当然莫迪亚诺离我们熟悉的19世纪现实主义也很远。在莫迪亚诺的所有作品中,借用侦探小说形式,真相永远处在被探寻的位置,而且结果都是无所谓真相。重要的是在探寻真相的途中,主人公可以因为探寻本身而进入似真非真、似梦非梦的状态。

梦的状态在莫迪亚诺早期的小说里就已经存在,而且总伴随着现实——用《缓刑》里的话说来,是“街名……不可告人的国王、和纳粹合作的污点……孤独、遗弃、行迹存疑打零工的父亲的、在巡回演出之间奔波的当演员的母亲等等——”的部分,以至于现实也蒙上了一层非真的面纱。我们真的对周边的现实世界了如指掌吗?即便我们真的经历过什么;没有身份、没有归宿这些在德占法国背景之下的“事实”难道不是我们惯常的生存状况吗?在莫迪亚诺的笔下,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法国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难道身份、户口簿(莫迪亚诺有一部小说的确叫做《户口簿》)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吗,或者电话簿,或者是在他后期的小说中,试图探寻过去的人总是拿着的记录有过去种种的记事簿?人生本身,难道不是处于一个巨大的梦之中吗?这个梦,或许要到死去的那一天才能够醒来。

《地平线》中,博斯曼斯也有一个记着过去的记事本,但是他对这个记事本上的“事实”是这么思考的:他清楚地感到,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这个



《青春咖啡馆》法文版和中文版

《暗店街》法文版和中文版

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经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女,而你却不知道有这回事。如同在天文学上那样,这种暗物质比你生活中的可见部分更多,这种物质多得无穷无尽。

如果有一个认真的写作者,他花了一生的时间来告诉你,你眼见的的人生不过是“暗物质”中的几个微弱闪光,那么他便只好顺着去想,真实又究竟何在呢。令人有些手足无措的是,莫迪亚诺写到这里,的确已经回答了当初在《星形广场》中提出的问题,那就是,暗物质构成的人生中,我们无法确认自己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方式只能是迷失。而进入21世纪之后,莫迪亚诺也同样以“前后呼应”的方式完成了“迷失三部曲”,亦即1985年的《迷失的街区》、2007年的《青春咖啡馆》(直译为《迷失青春的咖啡馆》)和今年10月才出版的《以防你迷失在街区》。

至于在这迷失的人生中,写作者又承担了怎样的责任,或者说,他的动机是什么——当然绝对不是奖项,作者自己也在这部获奖前才出版的新书中,借助他人物给予了回答,写作就是“向那些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发出信号,就像是灯塔的灯语或者摩斯密码”。

或许,写作与阅读都只不过是发现“暗物质”之旅吧。虽然,我们很清楚,我们所发现的这一点暗物质与显现的人生一样,都只是我们可以洞见的、微小的部分。

注:乌力波(Oulipo,潜在写作工场)是一个由作家和数学家组成的松散的国际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将自己定义为一群“试图从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中逃出的老鼠”。它由法国诗人、作家雷蒙·格诺和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内创立于1960年,至今仍活跃于法国乃至世界文坛。

我的阅读

莫迪亚诺的巴黎情结

姜海佳



尽管莫迪亚诺获得的法国及欧洲文学奖近乎等身,他在法国文学界的知名度也丝毫不亚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位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但时隔仅6年,诺奖又颁给法国作家还是颇有些令人意外。

与喜爱冒险的勒克莱齐奥远跳非洲和美洲的视角不同,保守而有些孤僻的莫迪亚诺钟爱的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巴黎——一个刘瑜称之为“全世界人民的故乡”的地方。当然,全世界人民不可能都回到这个精神的家园,幸运的莫迪亚诺却与他的家园耳鬓厮磨,惘然忘我。他流连于它的每一条大街小巷,穿过塞纳河上的每一座桥,坐着地铁来到令他沉醉的每一间咖啡馆,驻足于每一个广场,静静地猜想过往的每一个人身上的谜。在一次采访中他坦承,巴黎每天都有无数无名的人相互擦肩而过,常常引起他的浮想联翩,于是产生了让那些隐没在匿名状态下的面孔和行为都浮出水面的欲望。

他对巴黎的这份眷恋和执迷,无疑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莫迪亚诺出生于二战刚结束的巴黎郊区,他的犹太父亲在占领时期为求得庇护竟偷偷与盖世太保勾结,战争结束后仍继续从事黑市交易,而巴黎正是他罪恶行径的舞台。父亲的神秘行踪总是勾起莫迪亚诺追寻父亲和揭开秘密的欲望,于是我们看到“抗战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们在巴黎寻找,在巴黎挣扎,最后在巴黎迷失。《星形广场》中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奇在被占领的巴黎城内为了获得合法身份而沦为法奸,拥有令法国人骄傲的凯旋门的星形广场也沦为各种疯狂活动的集中地。同时为盖世太保和抵抗组织效力的双重间谍特鲁巴杜尔(在盖世太保这边的名字——也叫朗巴勒公主(在抵抗组织中的代号)——在《夜巡》中竭力周旋于巴黎的四方阵营之间,不堪肉体的奔波和心灵的分裂,最终走上绝路。追寻父亲的身份和行踪则成为《环城大道》主人公的梦想,他在巴黎十年不懈寻找父亲,最后在巴黎找到了父亲,也了解到父亲的犹太身份,但对父亲的奇怪举止依然百思不得其解。

用“父债子还”来解释莫迪亚诺精神上的负罪感,丝毫不为过。父亲做的孽,如梦魇一般萦绕在莫迪亚诺心头,久久挥之不去。他选择通过写作来进行心灵的救赎,无疑他成功了,而且应了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他22岁创作、23岁发表的外处女作《星形广场》,甫一出版便获得了法国当年(1968年)的两个文学奖。

显然,创作上的成功减轻了莫迪亚诺的负罪感,使他如释重负。渐渐地,他走出了阴影,二战也不再是他作品中的唯一叙事背景,不过他对他巴黎的温情丝毫未减。在他后来的大部分作品中,除去少数几个例外,他的主要叙事空间依然没有离开巴黎。

莫迪亚诺的父母都是为了生存在巴黎打拼的异乡人,与他们不同的是,莫迪亚诺出生在巴黎,对巴黎自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然而父母之间的关系日渐恶化,他们也都想逃避对莫迪亚诺和他弟弟(10岁时夭折)的抚养责任,于是让他长期在寄宿学校里生活,或者把他寄养在亲戚朋友家。他的心灵如同无根的野草,在巴黎找不到可以安心的归宿,始终处于漂泊状态。巴黎的两面性——既包容各色人等,又对他们不闻不问——使得匿名与孤独成为这里的生活常态。莫迪亚诺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不过是想要得到这个城市的物质化认可罢了。于是,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巴黎的感情是矛盾纠结的:对其中某些区域无比痴迷、眷恋,却对另一些地带极其排斥,设法躲避。而这种矛盾的情绪都从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流淌出来。

《夜半撞车》中,“我一直对巴黎的秘密非常敏感”。“我”的父亲选择与“我”面对的咖啡馆,渐渐从富足、物质化、发达的右岸,转移到思想激进、物质贫瘠的左岸。同时变化的还有父亲愈发破旧的衣着、日渐暗淡的神色、困顿中的父亲,还有那个在左岸咖啡馆里宣扬先锋思想的哲学博士,都引起了“我”的某种麻木和对左岸的排斥情绪。这种麻木一旦在“我”过了塞纳河回到右岸时便化为乌有,对“我”而言,右岸是实的,让“我”有一种“把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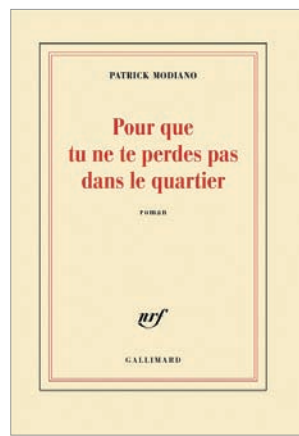
在“我”遭遇车祸的那晚,巴黎的神秘感再次打动了“我”。“我”从未见过如此深邃的宁静,似乎预示着什么东西——一场突如其来而车祸。这一静一动令巴黎的神秘色彩更加浓厚,也让“我”从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状态中醒来,使“我”对此前的人生做一番思考。

对于我们而言,巴黎的神秘感还隐藏在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街道名每一个门牌号里。《暗店街》中的罗兰按图索骥寻找的一个个地址和人名,对于一个想在“一片朦胧”中重绘自己人生的失忆侦探而言,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多拉·布德德》中的“我”在采访多拉生和居住的地点以及她读书的修道院时,竟然发现自己曾经的人生轨迹常常与多拉相互交错,神秘色彩越发浓厚;在《青春咖啡馆》中,露姬和罗兰甚至躲进巴黎的一些神秘的“中性区”,这些地方因人逃窜至而给人以安全的错觉,却如同黑洞一般能让一切遁入无形。

“我觉得奇怪的是”,莫迪亚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在五区、蒙马特、十四或十五区的某些地带,我们会遇到一些几十年前就见过、从未谋面过的人,他们跟从前一样年轻,外表也一样。”同样的神秘事件也被移植到《地平线》中,博斯曼斯40年后在巴黎的某个他不认识的公园,见到一个酷似莫迪亚诺的年轻女子时,坚信自己和玛格丽特是进入了科幻小说里描绘的两条时光通道,呼唤她是没有用的,因为她不可能认出他来。

巴黎的每条街道都有莫迪亚诺的足迹,他脚下的巴黎总是有着探索不完的奥秘,他笔下的巴黎对我们则散发着持久而神奇的魅力。

记得多年前读过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那是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巴黎的人文古迹以及巴黎之所以成为巴黎的历史与文化,都在作者流畅明快的文字中跃然纸上,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就这样悄然建立。其实,阅读莫迪亚诺的小说,也是跟随作者寻找巴黎的一次有趣体验,如果你手边有一张详细的巴黎地图,在和小小说里的人物一起“调查”、“追踪”的同时,作者构建起来的“个人记忆中的神秘巴黎”也会在你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莫迪亚诺2014年新作《以防你迷失在街区》法文版